



华中根据地对日伪的金融斗争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国民政府切断对新四军的军饷供给，而新四军所在的华中根据地被日伪军分割包围，分散于苏北、苏中、淮北等8个战略区，面临着严酷的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日军在华中地区强制发行伪币、排斥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导致根据地金融混乱、物资外流，严重威胁军民生存。在此背景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积极与日伪进行针锋相对的金融斗争，建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满足扩大生产、保障军民生活的需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夏珊珊 盛海丰

构建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

首先，开设银行，发行抗币。为巩固华中敌后抗日阵地，中共中央于1940年11月1日发出《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要求中原局和新四军抓紧根据地政权建设，设立银行，发展工农业生产。根据指示，刘少奇、陈毅决定迅速筹建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1941年4月，新四军创办的第一所银行即江淮银行在盐城成立。随后，淮北银行、淮南银行、大江银行等相继成立。抗战时期，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成立了十大银行，共发行了约242种纸币。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区的银行合并成华中银行，发行华中币。银行的建立与货币的发行，对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维持币值与物价稳定，加强市场调控。为保持抗币币值与根据地物价稳定，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严格控制抗币发行量，强调“经济发行”而非财政发行。发行量力求与根据地的粮食、棉花、布匹、食盐等物资储备和市场需求相适应，避免滥发导致通货膨胀，以建立和维护抗币的信用。二是加强外汇管理，

防止伪币、法币在根据地泛滥。各地采取严格管理外汇的办法，由银行或银行指导下的交易所规定比价进行兑换。敌占区的商人持伪币向抗战区购买土特产品（战备物资除外）时，要在银行或交易所换成抗币使用。抗战区公私商店如向敌占区买进必需物品时，也要在银行或交易所换成伪币。对商人和民众持有伪币、法币的，要求到边区银行下设的兑换处兑换抗币。三是建立抗币本位制。统一解放区币制，部队、政府的开支，发放各类贷款，一律使用抗币。货检贸易机关及各地合作社一律以抗币为计算单位核算货价。缴纳税金和商业买卖也须使用抗币。根据地与日伪区、国统区接壤地带，视具体情况酌情处理。

最后，开展农业与工商业信贷投资业务，鼓励发展生产。为支持发展生产，根据地银行向农民、手工业者、合作社发放各种低息农业贷款、手工业贷款。除了向工商业投资外，各银行还开设了工商业贷款业务。如发放小业主贷款，给商人贷款以鼓励其到敌占区城市采购生产、生活物资，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必需。

开展货币斗争

坚决排斥和禁止伪币的流通和使用。各地一方面将货币斗争与物资管理密切结合起来。将根据地出产的主要物资，如棉花、粮食、油、盐等加以管理，限制出口。商人必须带回物资，不许带回伪币。另一方面灵活调整斗争策略。根据地在严格查禁伪币的同时，贬值征收一些伪币作为对外支付手段，组织和利用伪币向敌占区换根据地所需要的物资，这样既达到查禁伪币的目的，又照顾群众的经济生活。为了达到还击敌人的目的，根据地政府采取“以伪制伪”的对策，即拿出一定的资本兑换伪币，在伪币增值时去敌占区购买物资，而伪币贬值时，将伪币大量抛出，加速伪币贬值。

对法币既联合又斗争。在抗战初期，

法币是各战略区的主要流通货币，在华中地区根基深厚，加上抗币发行较晚，若过早限制法币会加剧伪币入侵。在斗争初期，根据地采取联合法币排斥伪币的策略，发动群众使用法币、抵制伪币。之后由于汪伪政权宣布废除和禁用法币，法币在华中地区的地位大大降低，并且通货膨胀愈发严重。为保障华中敌后各地人民的利益，根据地增加抗币的发行，对法币采取限制的政策。如将票面一元的新抗币作五元法币使用，停止使用“中农票”，限用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法币。对法币采取分等级使用的策略，票色尚好的法币和抗币一起流通，破旧的不支持流通，或者按票面贬值使用，防止破旧法币充斥根据地。

利用比价斗争武器

抗日战争后期，各地进一步采用比价斗争的方法限制法币流通。1945年8月，华中局财委会提出，法币使用时须按照1:50（华中币1元折国民党法币50元）之比率折算。抗日战争胜利后，华中币成为华中地区的主要流通工具。根据地采取以华中币收兑法币封存出口的办法，再用法币换回根据地所需要的物资，达到了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

金融斗争的显著成效。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金融工作和货币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经济金融战线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稳定了物价

水平，维护了根据地的经济秩序。抗战后期，抗币成为华中民众最钟爱的货币。老百姓真诚地相信：“抗币是我们自己的货币，抗币越藏越值钱。”二是通过银行金库管理战时资金，保障了军事供给，设立的黄桥、靖江等外汇交易所，建立了通往上海、南京的地下汇线，支持了地下工作。三是通过发放农业贷款、手工业贷款、商业贷款，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在新四军的金融工作中，还走出了薛暮桥、骆耕漠、顾准等专业人才，为新中国储备和培养了一批懂业务、政治强的金融骨干。

据《学习时报》

林语堂的金婚礼物



华工，林语堂就与妻子一起到法国半工半读。当时德国马克贬值，林语堂使用积蓄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由于生活拮据，廖翠凤贱卖了自己的首饰贴补家用，支持林语堂继续读书，虽然她很心疼，不过林语堂却安慰她说：“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

此后，林语堂与廖翠凤不离不弃，夫唱妇随、相濡以沫。1969年，他们在台湾举行结婚50周年庆典，林语堂特意地为妻子准备了一份特别的金婚礼物——一枚金质胸针，上面镌刻了“金玉缘”三字，感谢廖翠凤的陪伴与付出，以表达他对妻子深厚而持久的爱意。同时，刻下美国著名诗人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它翻译成中文五言诗：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有人问他们，50年美满婚姻的秘诀是什么？林语堂同廖翠凤抢着回答：“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在长达50年朝夕相伴的日子里，他们各自都尽量“给”，从不斤斤计较于“受”。林语堂更感慨地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要飞到哪儿去呢？”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林语堂早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经人介绍，与当时在上海圣玛利书院读书的廖翠凤相识并交往，他们都是福建人，林语堂出生于漳州，廖翠凤出生于厦门鼓浪屿。

1919年1月9日，25岁的林语堂步入圣公会教堂，与24岁的廖翠凤举行西式婚礼后，携新婚之妻赴美留学。林语堂在哈佛大学研究所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可他的助学金（“半额奖学金”每月40美元）一度难以以为继。无奈之下，他们先后向廖翠凤的二哥以及胡适求助，分别借了1000美元和2000美元。

后来，适逢中国劳工青年会招募

赵朴初诗挽徐伯昕

徐伯昕是民进创始人之一，他曾生活周刊社负责出版、发行及广告工作。周刊初创，经费紧张，无法请社外人作画稿，徐伯昕充分发挥美术特长，为周刊拉广告、画插图。1928年，随周刊扩版及销量激增，出版、发行及广告工作更为繁忙，徐伯昕常白天奔忙于外，晚上伏案工作至午夜。邹韬奋在《生活史话》中这样回忆徐伯昕所做的工作：“（他）一面推广销路，一面设法大拉广告。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怙惠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过一天。”可以看出，徐伯昕是位经营高手。

工作确实很辛苦，邹韬奋说：“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指孙梦旦）两先生共

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寂静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们这三个人，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是和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夹在无数的好友丛中工作着！”话语中充满了以苦为乐的达观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徐伯昕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政协、统战工作上。刚开始，徐伯昕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一次宴会上，周恩来总理自己脱不开身，特地请身边同志转告，希望徐伯昕愉快地工作。徐伯昕感慨，总理那么忙，还记着我这一点小事。

徐伯昕的工作能力与成绩有目共睹。1984年3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听闻徐伯昕去世的消息，哀悼之余，作《伯昕同志挽诗》：

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

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

病苦忍不堪，曾不闻呻吟，

扬眉言国事，知君始更深。

诗虽简短浅近，但充分表达了对徐伯昕所取得成就的赞许。

周二中 据《人民政协报》